

三百年遗响

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

刘晓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曲音乐研究

0)

三百年遗响

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

刘晓静 著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



00075353



上海三利书店

1845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百年遗响: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 / 刘晓静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10

ISBN 7-5426-1729-X

I. 三… II. 刘… III. 蒲松龄—民歌—乐曲—研究

IV. J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436号

三百年遗响——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

著 者/ 刘晓静

责任编辑/ 黄 韬

装帧设计/ 范峤青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 订/ 上海海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25

印 数/ 1—1100

ISBN7-5426-1729-X

G·586 定价 27.00 元

出版说明

该书是一部较系统、较完整、较有独立见解的民族音乐论著。它通过对蒲松龄俚曲音乐的产生、艺术特点、音乐形态特征以及代表性曲牌等方面的综合分析、研究，确立了蒲松龄俚曲对清初以后戏曲、曲艺音乐艺术的影响及其在传统音乐文化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全书结构严谨、文字通畅，选用了大量古今音乐资料的有关谱例。可供民族音乐工作者、民间音乐爱好者、群众艺术馆音乐干部、民间文艺工作者以及文学、历史等有关领域的学者和研究者参考和学习。

序

刘晓静博士所著《三百年遗响》一书，是一本研究蒲松龄俚曲作品的专著。《聊斋俚曲集》自上个世纪 30 年代经路大荒先生整理刊布以来，虽有些论及它的零星文章，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论蒲松龄俚曲文学及其音乐形态的研究著作，无疑，这对全面、深入而系统地研究蒲松龄文学艺术成就，有一定的影响，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现在刘晓静博士将其学位论文《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经过修订，以《三百年遗响》为其书名正式出版，实在可说是为蒲松龄研究弥补了一个缺陷，值得欣幸。

在蒲松龄研究上，长时期以来学者们一直集中于《聊斋志异》的研究，无论国内或国外大多如此。而《聊斋俚曲集》于 1936 年公刊后，同年路大荒先生又于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了注解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这书在是年 5 月阿英主编的《火炬 通俗文学》周刊第六期，由且同写了《磨难曲》文章评介，但也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经过十年之后，周贻白先生才在赵景深先生主编的《通俗文学》周刊第五期上，发表了《蒲松龄的聊斋俚曲》一文，综合论述了《聊斋俚曲》。周先生关于我国戏曲、曲艺的研究，比较重视音乐遗产，对蒲松龄俚曲作全面论述，算是开了个好头，可惜此后再没有接续去

做。

聊斋俚曲是文学、语言、音乐和表演相结合的艺术，其文化的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综合的整体中，为主的音乐成分常与相关艺术相互影响、渗透，形成深层的综合。聊斋俚曲的音乐结构，大体如此。本书作者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的科学方法，用大量田野工作调查的收获，结合历史文献中相关的音乐遗产进行分析，从而取得了一些前人未能涉及的新成果。而且书中关于聊斋俚曲的音乐结构特征、曲调同淄川方言关系以及艺术风格等等分析，也颇有精炼和独到的论述。

总之，刘晓静博士研究蒲松龄俚曲取得了可喜的新成果。我相信本书问世后，对开拓蒲松龄文学艺术的跨学科的研究，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德栋

2002年10月25日

于济南

序

明清时期的“小曲”，文献中或作“时尚小令”、“时调小曲”、“时调”、“俚曲”等。现代学者一般称做“俗曲”。已故著名学者叶德均教授在《宋元明讲唱文学》中，将宋元以来讲唱文学分为“乐曲系”、“诗赞系”两大类。乐曲系说唱文艺的演唱形式，即以不同的曲牌（曲调）单曲或数曲组成套曲，今人亦称“曲牌体”或“联曲体”。宋元以来的鼓子词、唱赚、诸宫调等说唱曲艺，南曲戏文、北曲杂剧及后来的明人传奇等戏剧形式，都属此类曲牌体的音乐文艺。明代正德以后民间兴起的“时尚小令”、“时调小曲”，最初是以流行歌曲的形式传播南北，到清代前期，它们已同各地民歌小曲结合，形成为许多具有地区特色的曲牌体曲艺和地方戏曲。康熙年间，以《聊斋志异》确立了在文学史上不朽地位的山东淄川文学家蒲松龄（1640—1715），又用故乡淄川地区流行的小曲创作了《通俗俚曲》14种（载于蒲氏碑阴，今习称“聊斋俚曲”），它们的演唱形态有说唱和戏剧两大类，是属于明清小曲（曲牌体）系统，综合音乐、文学及表演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作品。

笔者从事中国俗文学史和戏曲、曲艺史的研究，也涉及明清小曲，深感这方面的研究，必须有音乐学家们参与。据

笔者所知，十几年来，一些年轻的音乐学者致力于此，并取得可喜的成果。刘晓静博士的《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便是其中之一。刘晓静博士致力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师从上海音乐学院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江明惇教授。本书是她的博士论文，经修订补充，现正式出版。

本书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聊斋俚曲音乐研究专著。聊斋俚曲作品都有民间传抄本存世，但它们所用的 50 支左右小曲曲牌，传唱至今的则仅存 10 支，其中数曲的真伪尚有研究者提出质疑。本书研究聊斋俚曲的音乐，其难度相当大。作者通过大量田野调查采集的音乐资料（包括他人采集的资料），并发掘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资料，把聊斋俚曲放到民族音乐史的背景上，分析其成就和影响。这不仅是聊斋俚曲音乐研究的一大突破，且对明清小曲文学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本书共分三编。上编《蒲松龄俚曲概论》，阐述聊斋俚曲产生的音乐土壤、曲牌的来源和俚曲文学艺术的特色。其中既利用作者和他人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也有作者从大量文献中发掘的资料来证明。中编《蒲松龄俚曲的音乐形态特征》，涉及俚曲音乐结构的特征、俚曲曲调同语言（淄川方言）的关系、俚曲曲调的独特艺术风格等。这是本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其中有不少是前人未曾涉及，而由本书作者深入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比如论俚曲的音乐结构特征，根据聊斋俚曲分“回”叙事的结构特点，详细总结了其“回套”的组曲特点；又从聊斋俚曲作品整体结构出发，分析其“联套”的类型。在此基础上，肯定蒲松龄在俚曲音乐结构方面做的探索，指出蒲氏俚曲创作在清代小曲系统音乐文艺发展中的“先导”意义，从而肯定了蒲氏俚曲在民族音乐发展中的贡献。在通过聊斋俚曲的结构特征、曲调与语言的关系、调式与音调特征的大量具体的分析之后，作者认为：“聊斋俚曲音乐既具有

浓郁的文人氣息，又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其風格特征可以概括為八個字：抒情典雅，平易朴素。”下編《蒲松齡俚曲代表性曲牌分析》，選擇作者認為基本上完整地保留舊曲原貌的【疊断桥】【耍孩兒】【玉娥郎】【銀紐絲】四支聊齋俚曲曲牌，利用大量文獻資料和口頭傳承的各種有關曲譜資料，整理、歸納、比較、分析這些曲牌的來源、表現特點和改編情況，及其對後世戲曲、曲藝音樂的影響等。

對本書作者的研究方法，筆者認為有兩點值得肯定：

1. 音樂、文學、語言等多角度綜合研究聊齋俚曲音樂形態的特徵，不僅使音樂形態的研究內容充實，同時展示了聊齋俚曲作為綜合藝術的特點和成就，補充了單純文本研究的不足。

2. 本書立論均以大量的原始文獻和各種資料為基礎，並進行了極其細緻認真的比較、分析和歸納，不是膚泛的空談。儘管對作者的某些結論，可以提出討論，但就作者的研究來說，都是言之有據的。相對於當前學術研究中的一些浮躁之風，作者這樣的學風，應當提倡。

聊齋俚曲流傳下來曲調，都依附於特定的歌詞，本書作者就這些特定歌詞的曲調進行分析，這樣研究聊齋俚曲音樂形態會不會失之片面？對此，筆者是這樣認識的：中國民間音樂（不論是曲牌體或板腔體）在與唱詞結合及表達不同的內容時，都會在基本曲調的基礎上，用加花（如裝飾音、滑音）使之協調字音的聲調，並同加襯（襯字、襯腔、垛句）和拖腔的變化相結合，以表達作品中特定的內容和情趣。從現存聊齋俚曲的文本看，蒲松齡是能熟練地運用民間小曲音樂的此類方法的。在蒲松齡的故鄉，口頭傳承保留下來的這些俚曲曲調，特別是經過作者考證，基本上保留了聊齋俚曲音樂原貌的曲調，用它們來做分析研究的基礎，基本上能反

映蒲松龄俚曲创作的音乐特征和成就。如果能再结合俚曲文本中同调曲词做些类比的研究，根据就更充分了。

笔者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明清小曲，因此对作者结合淄川方言字调（四声的调值）和语调（语势、重音等）特点，探讨聊斋俚曲特殊的音乐风格的形成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特感兴趣。明清小曲流传南北，由于各地的方言语音、语言习惯的差别，其演唱音乐风格，乃至曲调，便发生变异。明代人所编戏曲选集选载的“时兴小曲”，有的便特地标明其声腔的地区特点，如《摘锦奇音》（明龚正我编，万历三十九年书林敦睦堂张三怀刊本）选“时尚浙腔【罗江怨】歌”，《词林一枝》（明黄文华选辑，万历年间福建书林叶志元刊本）选“时尚楚歌【罗江怨】【清江引】”。这些“浙腔”、“楚歌”【罗江怨】，曲牌、词格乃至作品都完全相同，它们的差别，便只能从地区性的特殊音乐风格来区别，这是单靠文学文本的研究难以体会的问题。同样，小曲流传各地而产生的大量异名变曲（可参见本书下编《蒲松龄俚曲代表性曲牌分析》所提到的各曲牌众多的异名及各地有关的异名曲调），它们在音乐上有密切的关联，是研究小曲传播途径和地域的根据。对这类异名变曲，音乐家从它们的音乐特征极易辨识，而单靠小曲文本和文献的研究，则相当困难。自然，最好是两者的结合。从本书的研究，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综合本书对蒲松龄俚曲音乐形态的研究，可以说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的研究成果。自然，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在学术探索过程中的阶段成果，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由于作者是将蒲松龄俚曲创作置于中国民族音乐文艺的历史进程中去探讨其特征和贡献的，这样遇到的问题便相当多。比如，作者在阐述蒲松龄俚曲创作组曲成套的音乐形态时，强调他突破了宫调的限制，这是同宋元以来经

过民间曲家发展了的诸宫调和文人曲家审音定律后的南北曲创作比较而言。就此类音乐文艺的发展看，它们最初都不受宫调的限制。论述南曲戏文的第一部著作、明徐渭《南词叙录》中便说：“（南曲）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元末著名戏曲家高明改编创作的南戏剧本《琵琶记》，被后世尊为“词曲之祖”。作者在剧本“开场”【水调歌头】中也自我表白：“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本书作者也提出，小曲本来就不讲究宫调，这同早期南曲为“随心令”是一致的。蒲松龄的俚曲创作，创造性地发展了小曲反映社会生活的容量，提高了小曲的艺术品位，同时，又满怀热情地为民众创作，使“村农”“市媪”“见者歌而闻者泣”。因此，他不会像士大夫曲家那样为小曲审音定律、“寻宫数调”，而使自己的作品脱离群众。在这方面，本书作者有精辟的阐发，此不赘言。

刘晓静博士尚有继续研究聊斋俚曲曲牌音乐的计划，其研究范围，包括没有直接传唱曲调的聊斋俚曲曲牌。笔者认为这一研究计划很有意义，同时建议可将视野放宽。近年陆续出版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各省市卷和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前辈音乐家搜集出版的民歌集中，都收入了各地大量民歌小曲和曲牌体音乐资料。笔者在涉及聊斋俚曲研究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想法：通过文献所载和口头传承小曲音乐资料与聊斋俚曲文本的认真比较、分析，音乐家可以恢复聊斋俚曲用过的大部分曲牌的音乐；经过整理、改编，可将蒲松龄俚曲作品中的精彩片段重新搬上舞台演唱。这应当是地方文化发展中的一件盛事。刘晓静博士结合她的后续研究，来完成这一工作，

是顺理成章的事。

刘晓静博士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曾数次来笔者处讨论。
今值其著作出版，特作本文致贺，并就正与作者。

车锡伦

2002 年 10 月 15 日

于扬州

序

很久以来，“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这个课题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不仅是由于蒲松龄《聊斋》中那些超凡脱俗的神怪故事有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也不仅是由于在“蒲松龄俚曲”中保存着许多清代初叶俗曲演唱原貌的宝贵音乐资料和它们在音乐史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更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蒲松龄这样一位封建时代的伟大文学家，是如何将他的作品一步步推向人民的。他在《聊斋志异》的写作已取得很大成就的时候，还要想方设法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俚曲”形式来传唱它，使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种精神对旧时代文化人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向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老院长表示想研究它。但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了却这个心愿。当三年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刘晓静表示愿意研究这个课题时，我非常高兴，立即同意她以此作为学位论文题目，并全力支持她的工作。

研究这样的课题，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第一是音乐的第一手资料十分缺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历来是“口传心授”的，虽然我国早已有了曲谱，但对民

间音乐记录甚少，且比较简略，距实际音乐较远；历史资料虽然不少，但大多仅存唱词或文字记载；现今存活的民间音乐虽然很多都具有较深厚的传统，但大多对其历史难以稽考。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民间音乐遗产正在迅速变异，有些甚至濒临泯灭，更加大了研究的难度。据上世纪中叶的实际调查，现存的“蒲松龄俚曲”除文字记载外，有音响的仅存十首曲牌，当然这已经是十分珍贵的了。因此，对历史音乐遗产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一是尽量详尽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从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和当今存活的民族民间音乐加以对照、综合、分析，找出其间的联系和一般规律。本文作者正是如此进行研究的。刘晓静多次去山东淄博蒲家庄进行实地考察，向蒲松龄的后裔家人了解有关“俚曲”的创作、传承、存活的情况，向尚健在的“俚曲”传人侯宇爽、郝恩波等人采集“俚曲”音乐，并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钻研有关的文献资料，广泛地了解山东其他有关的民间音乐，将它们和“俚曲”音乐资料联系起来研究，在音乐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以说，本文对“蒲松龄俚曲”音乐的研究，是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它不仅对仅存的音响和曲谱资料进行了曲式结构、腔词关系、音调、调式等方面的分析，而且还对一些主要曲牌的形成、流传、发展情况作了考据，并探究其音乐形态的变异情况；从“俚曲”曲牌的编配特点探讨“俚曲”和此前的“唱赚”“诸宫调”等以及此后的各种说唱形式的关系。这些无论从结论本身还是方法论来讲，都为民族音乐学的学术发展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另一个困难是综合研究的经验不足。中国老百姓历来有欣赏综合艺术的喜好，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大部分存活于

综合艺术之中：中国的古诗词历来是能够吟唱或可以和乐而歌的；传统民歌是音乐与诗歌的结合；曲艺是语言艺术、音乐和表演艺术的结合；戏曲是戏剧文学、戏剧表演、音乐、舞蹈和美术等的结合；仪式音乐是音乐、舞蹈、美术、表演和仪式程序等的结合，等等。即使是单纯的器乐，也因大多从综合艺术中脱胎而来，常常带有综合艺术的印记。在综合艺术的整体中，音乐是一个重要部分，与其他姊妹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相得益彰，发挥着独特的表现功能和艺术魅力。这是一种深层的结合，实际上，人们很难把音乐从这样的综合体中截然剥离出来。“俚曲”正是这样一种综合体。人们的认识从综合走向分离，又从分离走向综合，交替发展。分门别类的研究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但当我们把学科分割过细而缺乏综合思考时，造成了学术上各学科之间很大隔阂时，就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入和全面了。我们的音乐理论研究，也往往偏重于音乐形态方面而对其他紧相关联的姊妹艺术和文化背景的研究较少。要克服这样的局限，必须尝试用综合的研究方法。为此，作者钻研了有关蒲松龄的历史、生平、人文背景和文学成就等资料，并向有关专家请教，力求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在这方面，著名俗文学专家关德栋、车锡伦先生和蒲松龄研究的权威陈玉琛先生，对俗曲音乐深有研究的张仲樵先生，以及曾对“蒲松龄俚曲”音乐有过深入研究的吴钊先生和乔建中先生等，都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重要的指导。这是完成这一“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保证。

刘晓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辛勤的劳动，终于有了结果，《三百年遗响》今天问世了。它推进了“俚曲”音乐研究向纵深发展，也托出了作者为音乐学和“蒲学”研究作出的贡献。这无论如何是值得庆贺的。当然，学术探索之路是

无止境的。文章的不成熟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专家、同仁和朋友们不吝赐教。

江明惇
2002 年 9 月
于上海

前 言

“蒲松龄俚曲”是清代初叶明清俗曲流传到山东后产生的分支流派，它是蒲松龄采用淄川地方的方言俚语，利用民间流传的俗曲曲牌编创的。在长期流传演唱的过程中，蒲松龄俚曲得到了众多民间艺人、歌手的不断巩固和丰富，从而发展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兼具文人氣息和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品种。尽管其发生远离我们三百年之久，但它对中国俗文学和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蒲松龄俚曲开创了清初俗曲类说唱艺术的先河，保存、记载了很多曲牌联套体的结构形式和清初五十多个俗曲曲牌的名称，并提供了这些俗曲的词格、特点及应用等方面的信息。其中，还使十支曲调流传于世，成为当今少有的早期的“明清俗曲”之遗音。这些曲调历经十四代人的传承，由于它只在语言环境和生活环境相同的本地区流传，而且承传体系相对比较严密，所以仍然保留了古代音乐文化的精华和面貌，成为存活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明清俗曲”这一音乐品种。

对于一个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珍贵艺术品种，自然是值得我们潜心研究的，更何况这个艺术品种还是在世界享有盛名的文学家蒲松龄遗留下来的呢？这样看来，蒲松龄俚曲就更值得我们去认真深入地研究。作为一个出生于山东的民族音乐学